



马克思恩格斯传

奥古斯特·科尔纽著

马克思恩格斯传

II

1844—1845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著

王以铸 刘丕坤 杨静远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О. Корню
КАРЛ МАРКС
И
ФРИДРИХ ЭНГЕЛЬС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том второй
1844—1845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61年俄文版
译出,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柏林建设出版
社1962年出版的德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传
第二卷
1844—1845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著
王以铸 刘丕坤 杨静远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125印张 350,000字
1965年12月第1版 1980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7,801—27,800

书号 11002·427 定价 1.50元

目 录

第一章 卡尔·馬克思在巴黎	1
第二章 《經济学一哲学手稿》	129
第三章 《神圣家族》	285
結論	411
編者跋言	430

第一章

卡尔·馬克思在巴黎

馬克思在巴黎的那段时期的特色，是他的观点和实际行动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通过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分析而作好了准备的。馬克思由于进行了这样的分析而理解到，社会問題只有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細心研究，才可能在理論方面得到解决，而只有通过这一社会的全面改造，才可能在实践方面得到解决。

革命民主主义必須以专门保卫人民利益为前提，必須承认革命的实践是解决哲学問題和社会問題的唯一方法。馬克思由于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場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他就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达到了建立在对政治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上的、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虽然他也和黑格尔一样，把历史发展理解为辯证的、为客观規律所决定的发展过程，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一发展不是观念的产物，不是绝对精神的产物，而是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产物。同时他已經开始理解私有财产在社会与国家的形成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并开始意識到，历史发展是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矛盾来决定的。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馬克思認識到必須用唯物主义的辯证法来代替唯心主义的辯证法，而这种認識又使得他不仅能够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还能克服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使

这种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具有历史的性质。

馬克思也和費尔巴哈一样，认为主要的問題是消除人的异化，不过他与其說是从宗教的观点，无宁說是从社会的观点来探討这一問題的，因为他是从社会关系中引伸出宗教的异化的。同时他又摒弃了費尔巴哈的那种把社会关系归結为人类的自然关系的理論，并开始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社会机体，而把人的关系看成是社会关系，这就使得他对个人、社会和国家有了新的理解。

他把个人看成是特殊与普遍的統一；这样的个人本身必須过符合他的本质的生活。然而这一点，無論是在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的私有制基础迫使个人过孤立的、利己的私人生活）的范围内，还是在政治国家（这个国家像天地悬隔那样地脱离社会，它是虛幻的普遍本质，是某种抽象的普遍物）的范围内，都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认为，要消除政治国家中人的本质的异化，要消除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間的对立，必須通过消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必須通过把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結合起来，使人的社会本质和社会生活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内容。但是由于馬克思还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因而他也就不知道可借以實現社会关系中的变革的方法和途径。这一点也就說明，为什么他还没有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引伸出人的解放，而把“真正的”民主看成是这种解放的实现。

这一点还可以說明他当时所达到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什么还是不成熟的。而他是在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它建立在对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的理解上——代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后才达到这一新的世界观的。

直到移居巴黎之后，由于进一步更加深入地分析了私有制的社会、政治后果以及它的经济后果，他才了解到，消灭这一制度乃

是人获得解放的决定性条件，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消灭这一制度。

从“真正的”民主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这一新阶段，最初表现在马克思发表在《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里，这就是《論犹太人問題》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对政治解放的理解（第一篇論文《論犹太人問題》主要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时候，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出发的。这一批判性分析表明，人的异化是由私有制产生的，这种制度把个人的私生活同社会生活对立起来，把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对立起来，而政治国家只不过是人的普遍本质的虚幻体现罢了。他指出，政治解放是不完全的和不充分的，因为它并不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对立，从而将保存人的异化；他把人的解放同政治解放加以对比，认为人的解放必然会消灭这一对立，同时也必然会消灭人的异化。这样的解放只有通过消灭人的异化的真正原因——私有制——才可能实现。

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更加深入的分析，使得马克思能够进一步地看到私有制的决定作用和消灭作为人的异化的主要原因的私有制的必要性。现在他并不把国家看成是人类生活的理想领域，而把它看成是由市民社会的非人性质所产生的政治国家；由于在文章的结尾处对金钱的本质和作用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已经不是从社会政治方面，而是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理解异化了。不过他还没有认识到，私有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可能消灭；因此，人的解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马克思还没有看到这一解放借以实现的途径和方法。

这就是他的第二篇論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主题；他

在這篇論文里證明，人的解放必須成為無產階級和革命思想家的共同事業。這篇論文基本上也是論述人的解放的問題的，但是現在馬克思卻把人的解放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聯繫起來，從而使整個問題有了新的內容。他指出，消滅私有制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而無產階級革命則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結果。對階級鬥爭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的理理解，對社會革命在改造社會關係中的作用的理理解，意味著馬克思的思想中所發生的根本變革。現在他日益密切地把自己的批判和分析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要求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要求聯繫起來，從此馬克思之徹底轉向無產階級的立場就決定了他的全部思想的和政治的發展。

然而，由於他還沒有認清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发展如何使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尖銳化起來，因而他便多少還有些公式化地來理解這一鬥爭，把無產階級看成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由於達到非人化和異化的最後階段，已經接近於這樣一種地步，即正是由於這種非人化而將重新取得自己的異化了的本质。

為了更明確和更正確地理解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馬克思必須更確切地弄清楚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性质和規律。而1844年他居住巴黎期間着手在歷史和經濟方面進行廣泛的研究時，他給自己提出的正是這項任務。

馬克思和革命的巴黎

在巴黎，馬克思和他的年輕的妻子住在位於塞納河左岸的資產階級市區的瓦諾街(Rue Vanneau) 38號的一所房子里。和他同

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阿尔诺德·卢格和海尔曼·莫伊勒；莫伊勒是“正义者同盟”的巴黎领导人之一。

随着《德法年鉴》的停刊，马克思失掉了收入的来源，但是由于出售《年鉴》而得到的一些钱（卢格没有给他稿酬，只给了他若干册《年鉴》）¹，以及由于科伦的朋友们的帮助²，他还能继续自己的研究和工作。

燕妮这个时候正在专心地执行着一位年轻主妇的职务。1844年5月1日，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女孩子，而为了纪念她的母亲也给她起名为燕妮。不久之后，马克思的夫人就带着女儿到德国去让自己的亲人，首先是让自己的母亲看看这个孩子³。过去只在德国外省小城市住过的燕妮，和自己的丈夫一道在巴黎经历了一个不仅是幸福的时期，而且是充满着精神事件的时期。就是在先前，她也具有民主的观点，并且曾在具有反动思想的家庭成

1 参阅本书第1卷，第665页，注231。

2 在《德法年鉴》停刊后，由于荣克的倡议，马克思在科伦的朋友们决定寄给他一千塔勒以补偿因弗吕贝尔的破产而使他遭受的损失。克拉森博士、奥本海姆、冯·梅维森、荣克和其他人所凑集的这笔款项寄给马克思时还附有克拉森在1844年3月间写的一封信；参阅1844年3月13日克拉森自科伦给马克思的信（载《卡尔·马克思。生平和事业年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34年俄文版，第21页）；再参阅J. Hansen: Gustav von Mevissen. Ein rheinisches Lebensbild 1815—1899（汉逊：《古斯塔夫·冯·梅维森。一位莱茵省人物的传记（1815—1899）》，柏林，1906年，第1卷，第281、347页以下；再参阅1844年5月15日阿·卢格自巴黎给路·费尔巴哈的信，载A. Ruge,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卢格：《1825年至1880年的书信与日记》，涅尔利希出版，柏林，1886年，第1卷，第344页；“……此外，他在科伦的朋友们又给他寄去一千塔勒，而且看来他们打算每年都这样做。”（大约同样数目的一笔款子寄给了柏林的布·鲍威尔）

3 关于燕妮·马克思在巴黎的情况，参阅路易丝·多尔纳曼：《燕妮·马克思》，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5—60页。

員面前英勇地捍衛過這些觀點，結果使得她同家人完全決裂了。現在，在時常同她交談自己理論上的新發現的丈夫的影響下，她的世界觀完全改變了——她變成了一位革命戰士。而她對於馬克思所選擇的道路的正確性的信念，又加強了馬克思自己的堅定信念和鬥爭意志，對於這一點，他對燕妮終生都是感激的。從一開始，燕妮便帶着她在訂婚時所曾表現出的那種勇氣和決心，站到自己丈夫一邊。同時在她身上不僅表現了機敏的才智，還表現了精神上的巨大勇氣和獨立的判斷力。而如果我們記起，在燕妮生活的那個時代里，婦女，首先是有產階級出身的婦女，被看成是在經濟上依靠別人，在法律上和精神上不能和男子享有同等權利的人，那末她的這些品質就更加顯得難能可貴了。

《德法年鑑》停刊後，馬克思在巴黎一直住到1845年2月，而他所受到的影響並不下於恩格斯在英國所受到的影響。法國遠遠超過德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水平（德國的現代工業還只處於萌芽階段），對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及其終幕——1830年革命——的革命傳統的切身感受，意識到本身是一個階級的、強大的、戰鬥的無產階級——這些就是馬克思在法國所遇到的新的要素，而這些要素就成了他的新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的鞏固基礎。

當時在巴黎，革命的動蕩並沒有停止。由於在1830年的革命當中最後戰勝了專制制度和封建貴族，法國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從這一革命中得到好處的首先是資產階級的領導階層，銀行家和工業家。他們不僅把封建貴族，而且把中等階層和無產階級排除於國家管理之外，而使國家政權為自己的階級利益服務^{4,5}。因此

4,5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卷，第12頁）：“在路易·菲力浦時代掌握統治權的不

无产階級以及无产階級化的小手工业者和中等阶层就日益积极地起来反对他們。

在馬克思居住巴黎的期間，具有反政府情緒的巴黎工人的不滿最后演变成了頻繁的起义。这些起义的失敗並沒有挫折工人的斗志，巴黎变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这一点是有助于社会主义学說和共产主义学說的发展和传播的。經濟发展和社会发展把圣西門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变成了陈腐的概念，这些陈腐的概念被阐述得十分明确的社会主义学說或共产主义学說所排挤。当圣西門和傅立叶的信徒由于沉醉于空想的观念而多少脱离了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鼓动家却日益坚决地保卫无产階級和无产階級化的中等阶层的階級利益。不論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反对資本主义的那种导致中等阶层的消灭和对无产階級剝削的加强的后果*。在他們当中，除去資本主义的小資产階級批評者(如瑞士經濟学家西斯蒙第和欧仁·毕萊)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如拉梅耐和毕舍)之外，还有圣西門主义的信徒(如巴扎尔，他曾把这一学說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加以系統的論述)和傅立叶主义的信徒(如維克托·孔西德朗，他曾在自己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和平民主日报》〕上論述傅立叶的社会批判)。此外还有以維达尔、列魯和裴柯尔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他們要求生产資料的社会化并且指望有产階級的自觉，认为有可能通过和平的宣传使他們認識到社会改革的

是法国資产階級，而只是这个資产階級中的一个集团：銀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們相勾結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謂金融貴族。他們盘踞王位，他們在議院中强訂法律，他們分配各种俸祿优厚的国家官职，从內閣大臣起至国营烟草店止。”

- 同捍卫无产階級的階級利益的共产主义者不同，社会主义者所捍卫的乃是中等阶层的利益。

必要⁶。蒲魯東⁷就是這一類的社會主義者，儘管他在報刊上發表了革命的言論，他也力圖用和平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

作為受壓迫的中等階層階級利益的代表者，社會主義的空論家力圖保衛這種利益，使它既不受大資本的侵犯，也不受革命無產階級的侵犯，並力圖使私有制適應這種利益。他們要求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通過新的勞動組織進行社會改革，這在他們看來是既符合於中等階層的利益，也符合於工人階級的利益。法國革命和工人起義的失敗有助於加強這些社會主義者的為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立場所決定的空想觀點；他們借口革命失敗，試圖為自

- 6 西斯蒙第(Sismondi)，讓·沙爾·列奧納爾·西蒙德·德(1773—1842)——瑞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批評者。

畢萊(Buret)，歐仁(1810—1842)——法國經濟學家兼政論家，他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批評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他在他的著作《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1840年)中描繪了法國和英國各工業城市的赤貧情況。

拉梅耐(Lamennais)，費里西德·羅格特·德(1782—1854)——宗教社會主義者，《Paroles d'un croyant》(《一個信徒的話》)(1834年)的作者。

畢舍(Buchez)，菲力浦·約瑟夫(1796—1865)——法國歷史學家，聖西門的信徒，後來是天主教社會主義的思想家，臨時政府總統(1848年)。

巴扎爾(Bazard)，聖阿芒(1791—1832)——法國政治活動家，共和主義者，在多年的時間里他和安凡丹都是聖西門主義的主要代表者。

孔西德朗(Considerant)，維克托(1808—1893)——傅立葉的學生，《La Destinée sociale》(《社會的命運》)(1837年)一書的作者。

維達爾(Vidal)，佛朗斯瓦(1814—1872)——法國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盧森堡委員會秘書(1848年)。

列魯(Leroux)，比埃爾(1797—1871)——最初是聖西門的信徒，《Globe》(《環球》)的創辦人之一，《Revue de deux Mondes》(《兩個世界的評論》)的撰稿人。

裴柯爾(Pecqueur)，沙爾·康斯坦丁(1801—1887)——法國經濟學家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

- 7 蒲魯東(Proudhon)，彼埃爾·約瑟夫(1809—1865)——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

已蔑視一切革命的政治行动与社会行动的态度进行辯护。他們认为工人階級并不是現代的革命階級，而只是被剝削的群众，由于他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所以必須用社会改革来帮助他們。

他們的主要功績就在于批判了資本主义制度。他們強調指出，危机、經濟崩潰、中等阶层的无产階級化和对无产階級的日益加强的剝削会导致社会革命，而只有借助于他們所建議的改革才能防止这一革命。

以路易·勃朗、賴德律-洛兰和斐迪南·弗洛孔⁸为首的社会主义民主党支持他們的活動。这个政党认为以爭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政治斗争是实现社会改革的主要手段。它否认作为一种斗争方法的社会革命，并且把政治活动局限于提出普遍选举权的要求，而把普遍选举权看成是改造社会的最可靠的道路。

同社会主义的理論家和領袖相对立的是共产主义的領袖和理論家，首先是卡貝、德薩米和布朗基；共产主义的領袖和理論家作为无产階級利益的保卫者，并不想改良資產階級社会，而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摧毁資產階級社会，以便在它的廢墟上建設共产主义社会⁹。卡貝¹⁰也和社会主义者一样，否认任何革命运动并且

8 勃朗(Blanc)，路易(1811—1882)，临时政府成員(1848年)，出賣过1848年的六月起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他所著的《L'Organisation du travail》(《劳动組織》)一书在1839年問世。

賴德律-洛兰(Ledru-Rollen)，亚历山大·奧古斯特(1807—1874)，社会民主党的議會代表，临时政府成員(1848年)，和阿拉戈一道出版过《Le National》(《國民報》)。

弗洛孔(Flocon)，斐迪南(1800—1866)——1843年至1850年間巴黎社会主义民主党机关报《La Réforme》(《改革報》)主編。

9 參閱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頁)：“在1847年間以社会主义者見称的有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學說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却已經变成了不过是些漸漸死灭

力图只通过宣传和教育人民群众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思想。德薩米¹¹却和卡貝相反，他拒絕同資產階級作任何妥協并宣传无神論的共产主义。布朗基接受了巴貝夫的革命传统并号召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得到解放。布朗基也采用了巴貝夫的策略并組織了密謀活动和暴动（例如1839年的五月暴动），他认为工人通过这些密謀和暴动就可以夺得政权¹²。

不管这些社会主义的学說和共产主义的学說对馬克思有多大的吸引力，但其中任何一种学說都未能决定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他从一开始便放弃了社会主义学說，因为他懂得，人的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因此否定这一革命的卡貝的学說

的宗派。另一方面便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們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和各种补綴办法来消弭社会灾难而毫不伤及資本和利潤……反之，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当时却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在1847年間，社会主义是資產階級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則是工人的运动。”

- 10 卡貝(Cabet)，埃蒂埃納(1788—1856)——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他把民主看成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要过渡阶段，而作为最近的目标，他提出了普遍选举权的要求；他在1833年创办了《Le Populaire》(《人民》)杂志，他的著作是《Voyage en Ikarie》(《伊加利亚旅行記》)，巴黎(1842年)；他的信徒常常被称为“伊加利亚派的”共产主义者(參閱本书第1卷，第496—497頁)。
- 11 德薩米(Dézamy)，泰奧多尔(1803—1850)——法国政論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者，他最初是卡貝的信徒，后来同布朗基接近。
- 12 布朗基(Blanqui)，路易·奥古斯特(1805—1881)——热情的革命者；他相信可以通过密謀手段实现共产主义；他是秘密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他在1839年5月试图推翻資產階級国王路易-菲力浦的政府。“正义者同盟”也参加了这次起义，但这一組織在这之后就被巴黎警察当局摧毁了。布朗基四次被判处死刑并且在監獄里总共度过了三十五年以上。(參閱《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8頁：“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領袖，风暴时期的領袖，实践家的領袖，他們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理論上很弱……例如德国的拉薩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領袖。”)

便不能使他感到滿意。然而他也不同意布朗基主义。这一学說沒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危机和階級斗争的尖锐化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过渡，并且力图通过密謀的办法实现这一过渡。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学說的这些缺点，这特别是因为他在恩格斯的影响之下，已打算研究资产階級社会的經濟关系和社会关系，认为这些关系是这一社会本身通过无产階級革命而归于瓦解和消灭的原因。然而，这一点并不曾妨碍他对布朗基这个人抱有极大的敬意，因为这个人尽管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却仍然以不屈不撓的革命勇气保卫着工人階級的事业。馬克思終生都把这个人看成是争取无产階級解放的最忠誠和最无畏的战士之一。

拉梅耐、卡貝和布朗基的学說不仅在法国工人中間，而且在德国的“正义者同盟”里面也是流行的¹³。在布朗基所組織的1839年5月12日到13日的起义失敗之后，“正义者同盟”便受到了法国警察当局的迫害并且被解散了。它的一部分成員（其中有魏特林）逃往瑞士，另一部分（其中有排字工人卡尔·沙佩尔、钟表匠約瑟夫·莫尔和鞋匠亨利希·鮑威尔）則逃往伦敦，他們就在伦敦成立了“德国工人协会”，作为“正义者同盟”的一个支部。留在巴黎

13 关于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参閱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引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上卷，第202—228頁）；卡列尔：《威廉·魏特林》，1918年，第2卷，第1—52頁；Ch. Andler,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Introduction historique et commentaire*（昂德勒：《共产党宣言。历史背景介紹和注释》，巴黎，无出版年月，第6—20頁；Zlocisti, *Moses Heß, Eine Biographie*（兹罗齐斯基：《莫泽斯·赫斯》（传记）），修訂第2版，柏林，1921年版，第110—113頁，119頁以下；《Geheime Staatsarchiv》（《秘密国家档案》），Rep. 77, Tit. 537, Nr. 41, Rep. 77,《书报检查事务特别文件》，111。在40年代，居住在巴黎的德国人几乎有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裁縫和木匠。他們只是暂时地住在法国，后来便返回了德国。其中觉悟最高的和最进步的人都积极地参加了法国的革命工人运动。参閱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的同盟盟員的中心人物是海爾曼·艾韋貝克¹⁴和海爾曼·莫伊勒¹⁵。這三個團體一直保持着頻繁的通信聯系，後來就成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核心。

馬克思所接觸到的無產階級，即法國和德國的革命工人已經不是半哲學的抽象，而是具體的人了。馬克思在移居巴黎之後，立刻同“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和成員（他們在每個咖啡店集會¹⁶並且在那裡進行熱烈的討論¹⁷）以及法國的各秘密工人團體建立了

14 艾韋貝克 (Ewerbeck)，奧古斯特·海爾曼 (1816—1860)——醫師和文學家，卡貝的信徒，“正義者同盟”的盟員，後來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40年代初期，他亡命巴黎。1848—1849年他以駐巴黎特派記者的身分為《新萊茵報》寫稿。

15 莫伊勒 (Mäurer)，海爾曼 (1815—1885)。1829—1833年間他在柏林學哲學和語言學，後來到巴黎從事教育與文學活動。他是“被遺棄者同盟”和“正義者同盟”的創始人之一。他在某個時期曾是魏特林的擁護者。1848—1851年他住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在那裡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工作。1851年被逮捕，而在長期的監禁之後被逐出德國。此後他又在蘇黎世住了一個時候，然後重新回到法國。

16 參閱《秘密國家檔案》，Rep. 77, Tit. 500，內務部有關在巴黎的德國共產主義的報告摘錄。

“共產主義者的領袖艾韋貝克博士 (Rue des Fleurus (花街)，8號)

集會地點：(Rue des Bons Enfants (乖孩子街)，20號)

蓋列拉咖啡店 (Rue de L'arbre sec (枯樹街)，46號)

希維拉咖啡店 (Rue St. Pierre Amelot (聖彼埃爾·阿美洛街)，18號)

什萊貝拉飯店 (Rue Pierre de l'Ecot (彼埃爾·德·列科街)，22號)

‘彗星’旅館 (Rue de la Comète (彗星街)，7號)”

在這份報告里，還提到了住在倫敦 (King Street Soho (索荷區國王街)，24號) 的卡爾·沙佩爾同巴黎的通信。

17 參閱《秘密國家檔案》，內務部》，Rep. 77, D10號，第81頁。在1844年警察局的一份報告里報道了有關巴黎的共產主義集會的情況：“如果我們看一下，幾個陰謀家在怎樣把那些貧苦的德國手工業者引入歧途並且試圖不僅把工人，而且還把年輕的商人、商業代理人等等拉入共產主義運動的話……那確實是一個值得痛心的情況。德國的共產主義者每個星期日都在 Barrière à

联系；在这件事上，莫泽斯·赫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因为赫斯还在前一次到巴黎来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¹⁸。

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并没有参加这些团体当中的任何一个¹⁹。他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他并不同意这些团体的理论纲领，例如，不同意“正义者同盟”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是卡贝的学说、基督教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和费尔巴哈学说的混合物²⁰；马克思（同恩格斯一样）可能也有这样一种考虑，即秘密团体会使工人脱离理应起决定性作用的群众运动，而且这些秘密团体的活动的非法性质可以给政府以进行迫害的借口²¹。尽管如此，马克思却深切同情工人，因为工人的勇敢、信心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德国资产阶级的

Trône（宝座门）外一个酒商的一所房子里集会，这所房子临着大道，如果出城门，就在右手的第二或第三家（Avenue de Vincennes（文桑路））。常常有三十、一百或二百名德国共产主义者在这里集会，这所房子是他们租下来的。他们发表演说，公开宣传杀死国王，废除一切财产，惩办富人等等；这里已经谈不到任何宗教，简言之，这一切都是难以容忍的、极为令人厌恶的荒谬绝伦的勾当。我可以举出一些年轻的德国人来，他们的可尊敬的双亲每到星期日都把他们带到那里去毁他们。警察局当然知道每个星期日都有许多德国人在那里集会，但是警察局多半不知道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我非常紧急地把这写给您，为的是不让马克思、赫斯、海尔维格、魏尔、伯恩斯坦继续这样使年轻人陷于不幸。”

18 1844年7月9日阿·卢格自巴黎给弗莱雪尔的信：“马克思埋头于这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当然，这只是就他同它的代表者直接交往这一点而言的，因为，要说他认为这个可怜的运动具有政治意义，那是不可理解的。”参阅 A. Ruge, Briefwechsel 《卢格通信集》，第 359 页。

19 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3 页：“在我第一次居住巴黎的时候，和我个人保持接触的有同盟在那里的领导者，以及大部分法国秘密工人团体的领袖，但是我没有加入其中的任何一个团体。”

20 参阅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24 年俄文版，第 180 页：“这一同盟的秘密学说不过是德国哲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混合物。”

21 参阅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576 页以下。